

香港沙柳塘灣新石器時代 遺址考古收穫

鄭興華

一 前言

1991年12月至1992年1月，香港博物館考古隊，在馬灣島上的沙柳塘灣進行了六星期的搶救發掘，出土了不少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遺物。本文將簡要介紹這次發掘的主要收穫，並討論香港及鄰近珠江三角洲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考古的新進展。

二 地理環境

馬灣是位於大嶼山東北端的一個小島，中間隔著的海峽稱汲水門，是香港西面的主要門戶。馬灣面積約0.6平方公里，島上丘陵起伏，最高為南面的大嶺頭，高出海平面68米，北面的北灣頂則高53米。

沙柳塘灣位於馬灣東岸靠南處(圖一)，在現代的沙灘背後，有一條古代沙堤，南北走向，長約100米，高出海平面5.6米，跟現代沙灘平行，古代文化遺存，主要在這條沙堤裡發現。沙堤屬毗岸沙堤類型，背後沒有潟湖，直接為小山丘所環抱。這些小山，正好擋著冬天凜冽的北風。沙堤順著山勢，北高南低，南面有一條小溪，從西向東流入大海，小溪為人們提供生活必需的用水。因此，沙柳塘灣沙堤是古代先民理想棲息之地。

馬灣島岩性可分三大類型。屬於中及下侏羅統淺水灣組的粗粒凝灰岩，覆蓋島上大部份面積；一條帶狀的上侏羅統長石斑岩牆群，在島的北面外露，而島的東南角則由上侏羅統的長洲花崗岩所構成。因此，沙柳塘灣內的地質，主要屬長洲花崗岩。

三 調查和發掘

沙柳塘灣遺址，是英國考古家蒲國傑

(Brian Peacock)在1983年進行香港考古資源調查時發現⁽¹⁾，他在地表採集到一些屬於唐代灰窯的窯具殘件，卻未發現新石器時代遺物。

1991年，為配合赤鱗角新機場和大嶼山北部公路幹線工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考古隊，應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的邀請，在大嶼山北部進行考古調查。同年7月，在沙柳塘灣進行了十天的試掘，共開探方12個，發掘面積42平方米，出土了夾砂陶鉢、罐、印紋泥質軟陶片、石環、青銅劍等遺物，證明遺址保存了屬於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的文化層⁽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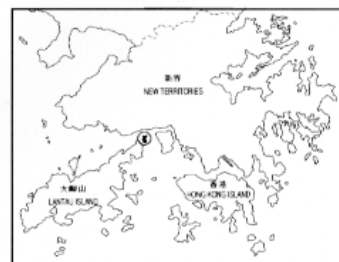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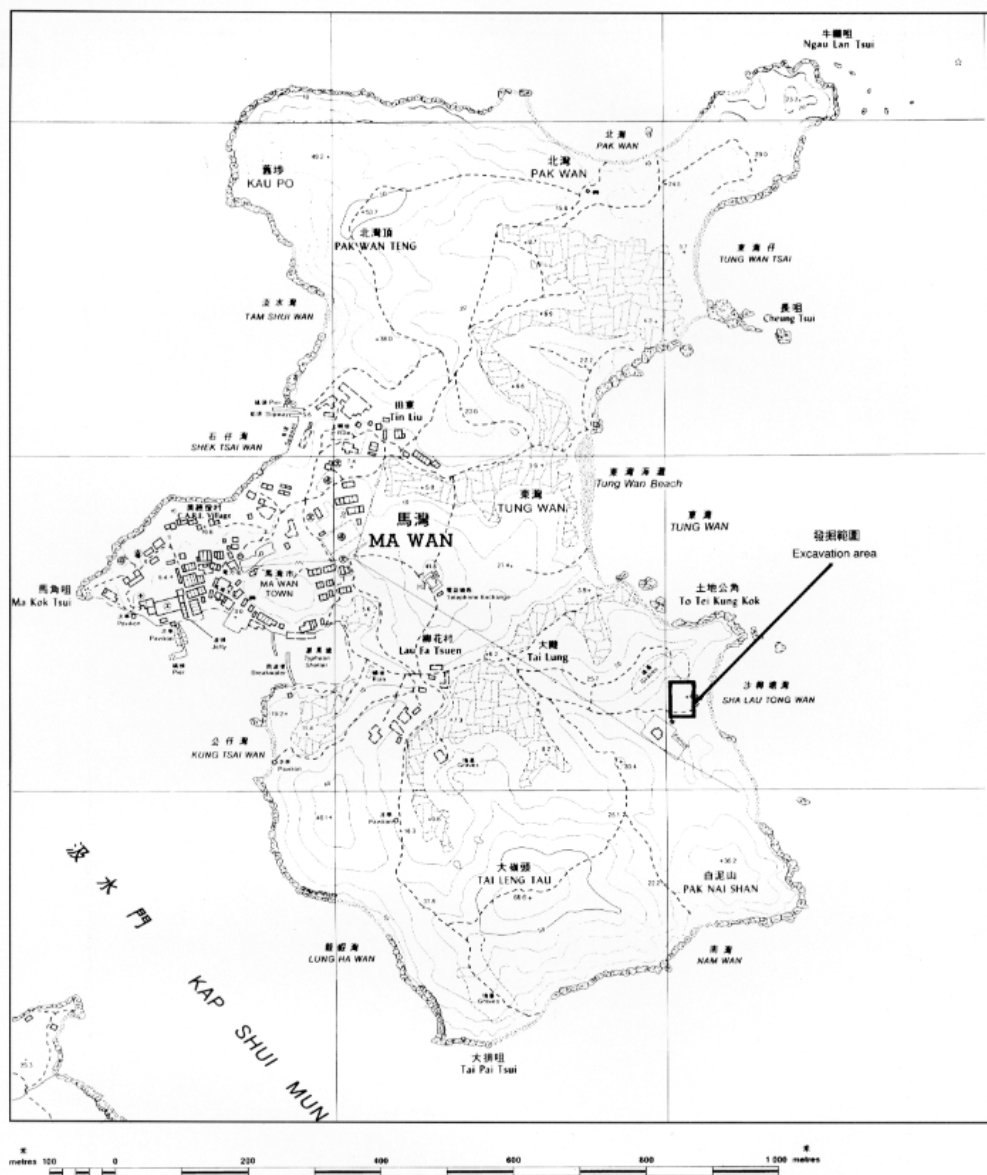
由於興建連接青衣島、馬灣、大嶼山北部的青馬大橋，沙柳塘灣遺址將被工程完全破壞。香港博物館考古隊，應古物古蹟辦事處的邀請，組織了這次搶救發掘，目的是把整個遺址全面揭露，盡量記錄和收集遺址內的考古資料。發掘工作從1991年12月開始，至1992年1月結束，共進行了六星期的田野工作，經費由香港賽馬會提供。

遺址本屬耕地，但久已荒廢。據村民介紹，二次大戰之後，有人來沙柳塘灣取沙作建築用途，以致沙堤上部約有1米厚的沙被取去，遺址亦受到嚴重破壞。根據村民提供的線索，配合實地觀察，發現因取沙的關係，沙堤形成高低兩部份，北部靠近山坡處較高，南部則較低，中間隔著一個約1米高的斷面。因此估計位於沙堤南部的遺址已受破壞，北部卻仍然完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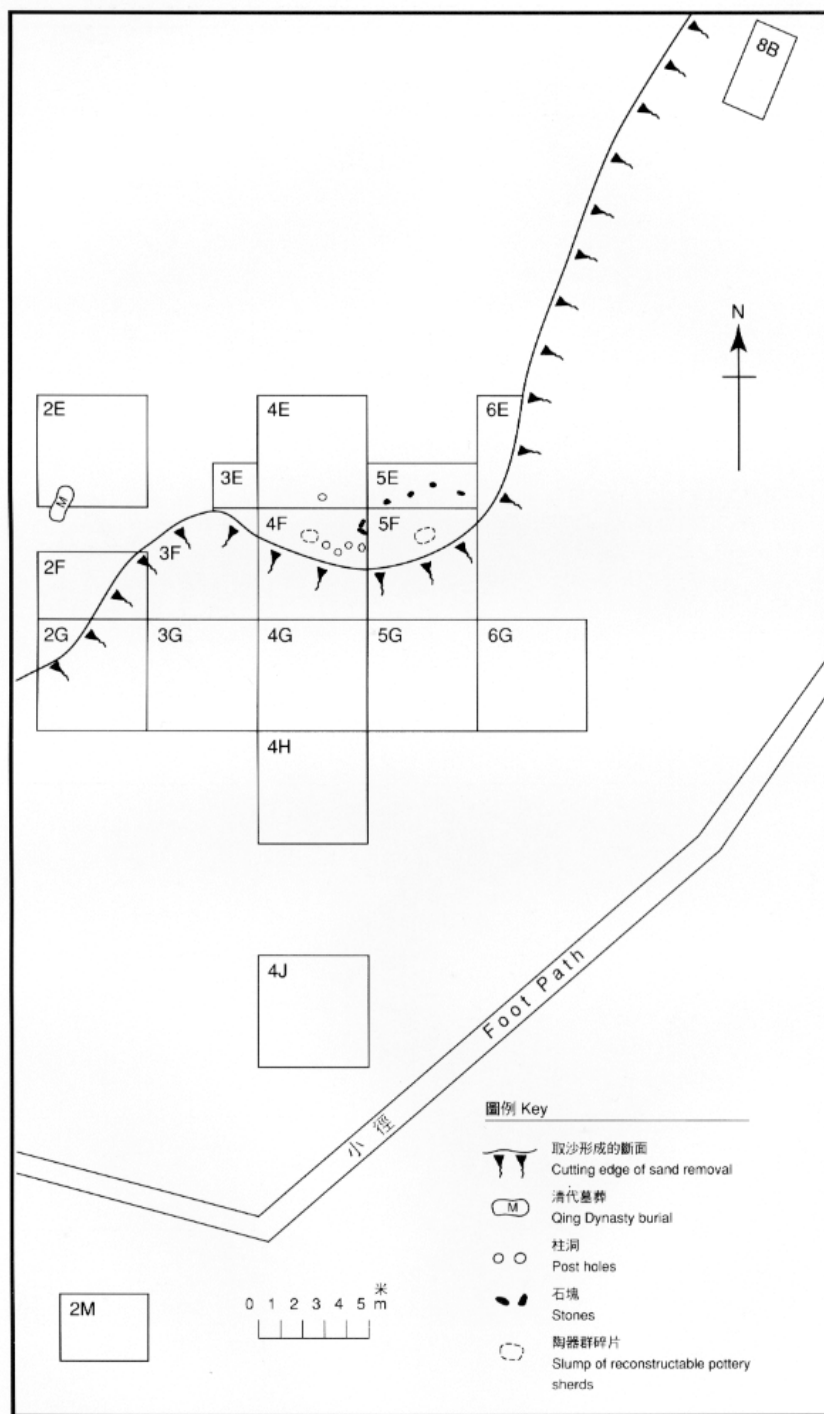
我們把遺址分為一系列5X5米的探方，按不同的土色和土質分層發掘。初期工作集中在沙堤北部未受破壞之處，在離地表深約50厘

Chau Hing-wah : Assistant Curator,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鄭興華：香港博物館助理館長



圖一 沙柳塘灣遺址地點圖
Location map of Sha Lau Tong Wan site



圖二 沙柳塘灣探方及遺蹟分佈
Excavation trenches and archaeological features at Sha Lau Tong Wan site

米處找到新石器時代文化層，出土了夾砂陶、泥質印紋軟陶器、磨製石器、礮石石器和柱洞遺蹟。後期把發掘工作擴大至沙堤南部曾受取沙破壞的地區，在離地表幾厘米處，發現不少磨製石器和夾砂陶片，遺物跟北部文化層內出土的遺物一致，似未受移動，應屬於新石器時代文化層底部的遺存，可惜文化層上部已受破壞。此發掘共開探坑18個，發掘面積共350平方米(圖二、三)。

四 地層

沙柳塘灣遺址地層簡單，主要在沙堤北部未受取沙擾亂處發現一個穩定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層。除此之外，在地表可檢拾到新石器時代陶片、唐代灰窰殘件、宋代青瓷、清代青花瓷片和近代的鄉村日用陶瓷破片，其中唐代灰窰的窰具殘件，大量發現於沙堤南部近海處，推測那裡可能原來有一處唐代的灰窰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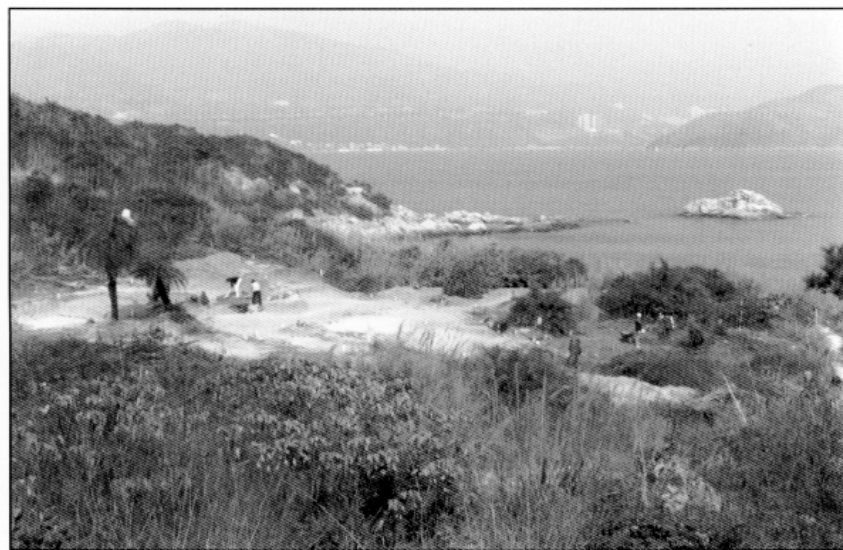
現根據探方4E東壁剖面(圖四)，把遺址地層分述如下：

第一層：細沙層，灰黑色，厚約10厘米，為表土層，包含大量草根和腐植物質。出土近現代陶瓷片和廢物如膠袋和汽水罐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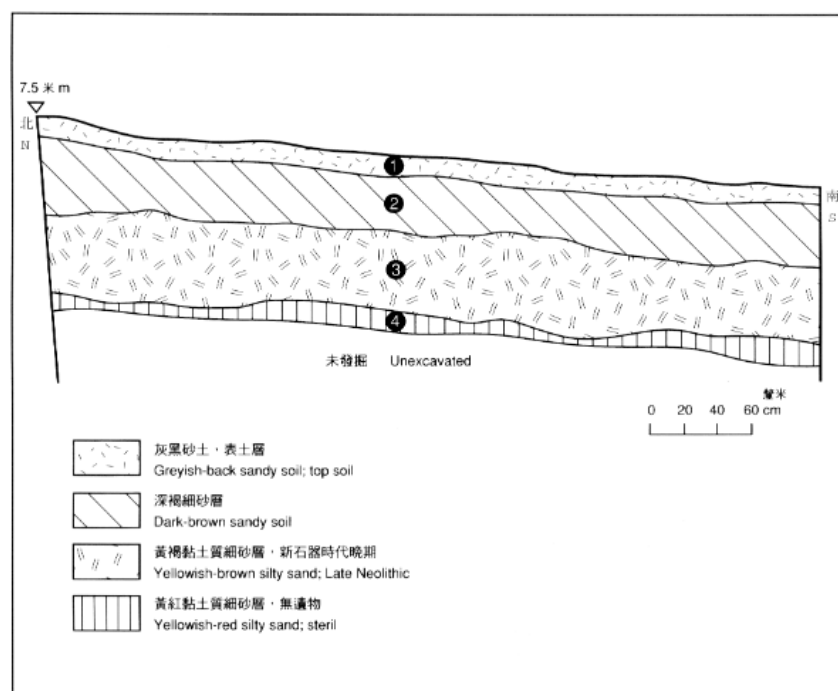
第二層：細沙層，深褐色，厚約40厘米。無文化遺物。

第三層：黏土質細砂層，黃褐色(7.5YR5/8)，厚約50厘米，出土夾砂陶和泥質軟陶器及碎片、磨製石器 etc 遺物，屬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層。

第四層：黏土質砂層，黃紅色(5YR5/8)，約發掘10厘米，無文化遺物，是為生土層。



圖三 沙柳塘灣遺址發掘情況
Excavation at Sha Lau Tong Wan site



圖四 探方4E東壁地層
Stratigraphy of Trench 4E east w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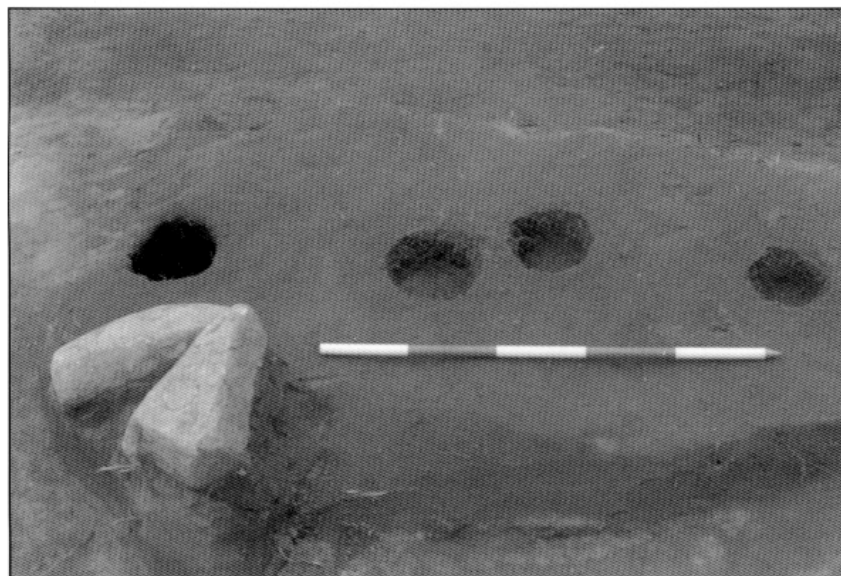
五 遺蹟

在探方4F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層內，發現了四個小型洞穴遺蹟，東西向排列，其中三個幾乎成一直線，洞穴間距最小約20厘米，最大為40厘米(圖五)。其中三個洞穴，口徑19-22厘米，深約12至15厘米，另一個口徑為25厘米，深33厘米。從這四個洞穴的佈局來看，可能是房子的柱洞，但其中三個深只十多厘米，是否真的是柱洞遺蹟，實難判斷。此外，在探方4E近南壁處，亦發現一個小洞遺蹟。此洞口口徑為15厘米，深9厘米。

在探方5E近南壁的新石器文化層內，發現了四塊被水磨刷得十分圓滑的礫石石塊，呈

橢圓形或圓三角形，長約30-35厘米。四塊礫石的分佈，成一弧線，礫石相距60-120厘米不等。特別之處，四塊礫石均以一平滑之面朝上，推測先民可能把這些石塊作墊坐之用，以免直接坐在潮濕的沙堤上(圖六)。

在探方2E南壁處發現一個清代墓葬，為土坑豎穴木棺墓。墓坑長約2米，寬約80厘米。出土時，棺蓋板仍在，但棺身已腐。棺內只發現極少量人骨殘片，以及一青銅髮簪、一對銀耳飾和一對玉手鐲。



圖五 探方4F發現四個洞穴遺址
Four holes were found at sq. 4F



圖六 探方SE磧石出土情況
Large pebble stones as found at sq. SE

六 遺物

沙柳塘灣遺址新石器時代文化層出土的遺物分陶器和石器兩類。陶器又可分為夾砂陶和泥質軟陶兩類。夾砂陶多呈灰黑色，泥質陶則多為黃褐色。根據出土陶片統計，夾砂陶約佔80%，泥質陶佔20%。紋飾簡單，夾砂陶片上只見繩紋，泥質陶片則見重圈紋和複線菱格凸點紋兩類印紋。復原器物共9件，包括泥質陶器兩件，夾砂陶器7件，現分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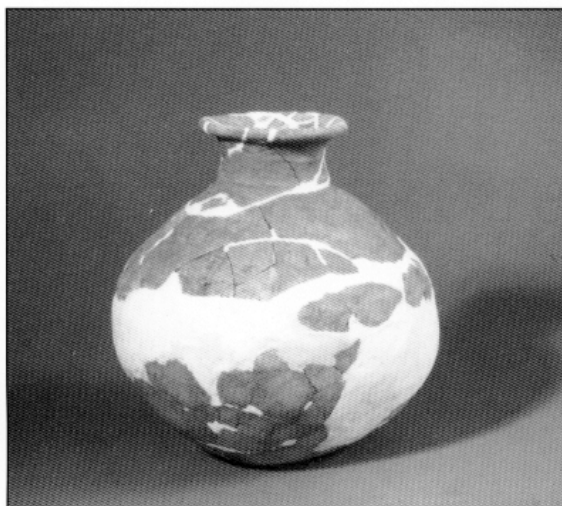
- (1) 泥質軟陶大壺(SLT-32)：侈口、直頸、鼓腹、圓底內凹、腹有一折、頸有兩道凸弦、下腹拍印複線菱格凸點紋，紋飾工整。壺通高46厘米，腹徑36厘米(圖七)。
- (2) 泥質軟陶豆(SLT-33)：豆盤口沿內翻、斜直身、圈足喇叭形、足上有一小孔。器身素面無紋，通高16厘米，豆盤直徑24.5厘米(圖八)。
- (3) 夾砂陶釜(SLT-34)：敞口、束頸、鼓腹、圓底。器身飾繩紋。通高15厘米，腹徑18厘米(圖九)。
- (4) 雙流夾砂陶罐(SLT-35)：敞口、束頸、圓腹、圓底，口沿對角捏成兩流，器身飾繩紋。通高15厘米，腹徑14厘米(圖十)。
- (5) 夾砂陶罐(SLT-36)：小口微侈、溜肩、圓弧腹、圓底。肩上一道凸弦，身飾繩紋。通高20厘米，腹徑18厘米。
- (6) 夾砂陶碟(SLT-37)：淺身、平底、素面。通高3.5厘米，口徑13厘米(圖十一)。
- (7) 夾砂陶鉢(SLT-28)：敞口、深腹、圓底、厚壁、器身飾繩紋。通高10厘米，口徑19.2厘米(圖十二)。

- (8) 夾砂陶器座(SLT-21)：口、足均外撇、束腰、中空、呈腰鼓狀、素面。通高12.7厘米，頂徑8.5厘米，底徑9.1厘米(圖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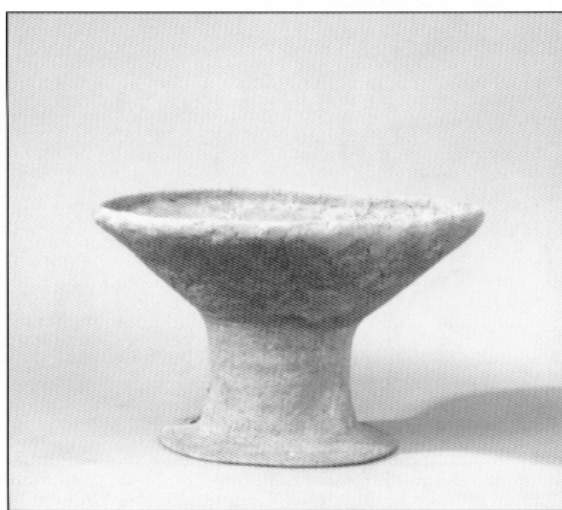
- (9) 夾砂陶器座(SLT-22)：腰鼓形、中空、素面。通高11.7厘米，頂徑9.4厘米。

遺址共出土石器23件，可分為磨製石器和礮石石器兩大類。磨製石器包括石鏃7件、石矛1件，礮石石器包括礮石3件、石砧10件、石杵1件和磨石1件。現擇其重要者分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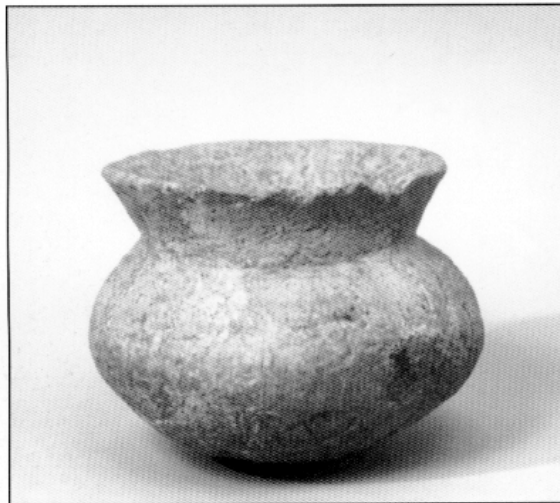
- (1) 有段石鏃(SLT-16)：泥質板岩製成。長方形，背部有段，單面斜刃，刃部內弧，除頂部外通體打磨精細。長13厘米、寬5.8厘米、厚3.7厘米(圖十四)，從刃部弧度推斷，此器可能是剝削工具。
- (2) 三角形鏃(SLT-19)：細砂岩製成。頂窄刃寬，呈三角形，單面斜刃，刃部微彎。長6.8厘米、寬3.9厘米、厚1.3厘米(圖十五)。
- (3) 石矛(SLT-7)：黑色泥質板岩製成。桂葉形，葉較長而薄，前段脊略棱起，兩側有刃，前出收鋒，後面柄部已殘。通體打磨光滑。殘長20厘米、寬6.2厘米(圖十六)。
- (4) 礮石(SLT-1)：紅色砂岩製成。器身共有六個平滑的磨面，可能是打磨石器或骨器時形成。此石長22厘米、最寬10厘米(圖十七)。
- (5) 石砧(SLT-27)：花崗岩礮石，石面扁平，一面中間有圓形凹陷，是敲擊硬物時做成。石砧長約21厘米。凹陷直徑約2.5厘米(圖十八)。
- (6) 石杵(SLT-10)：砂岩礮石，棒狀，兩端有敲擊痕跡。長12.8厘米、最寬4.5厘米(圖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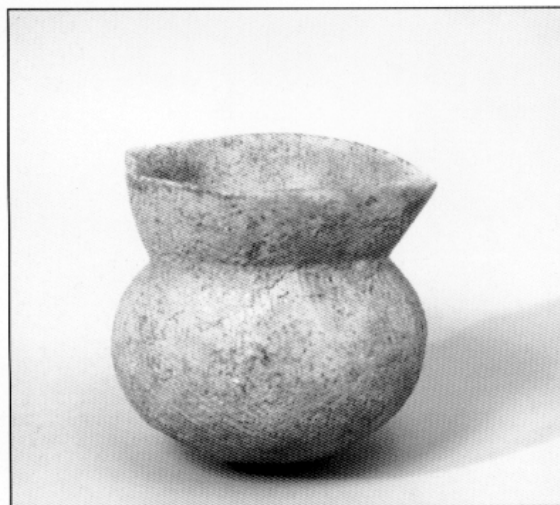
圖七 複線菱格凸點紋軟陶大壺
Soft pottery jar with lozenge and raised dot design



圖八 軟陶豆
Soft pottery d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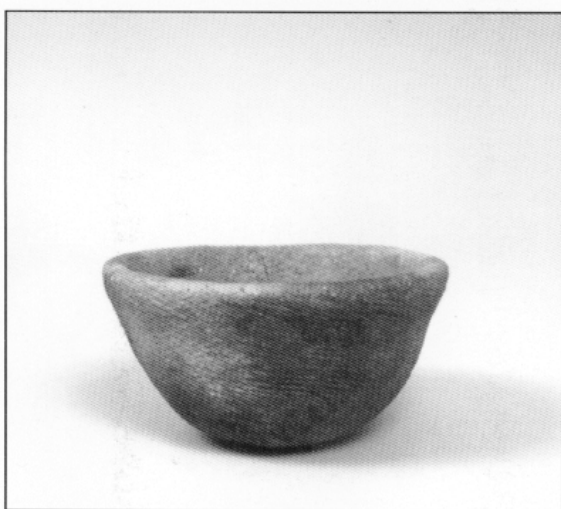
圖九 繩紋夾砂陶釜
Coarse corded pottery fu



圖十 繩紋雙流夾砂陶罐
Coarse corded pottery pot with two spouts



圖十一 夾砂陶碟
Coarse pottery dis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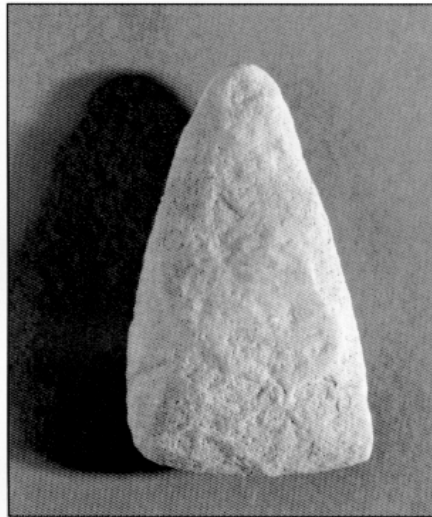
圖十二 繩紋夾砂陶鉢
Coarse corded pottery bow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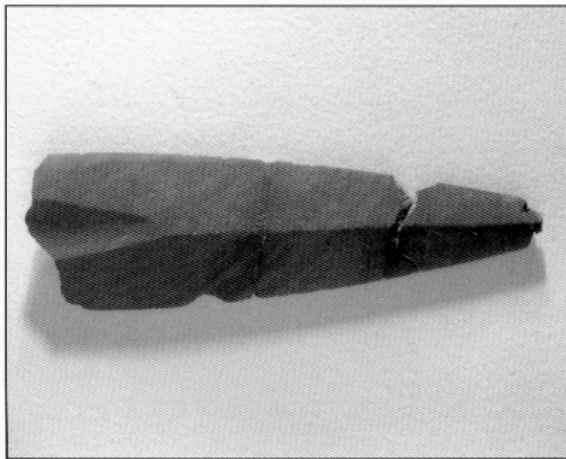
圖十三 夾砂陶器座
Coarse pottery stand



圖十四 內弧刃有段石鐮
Stepped adzes with concave ed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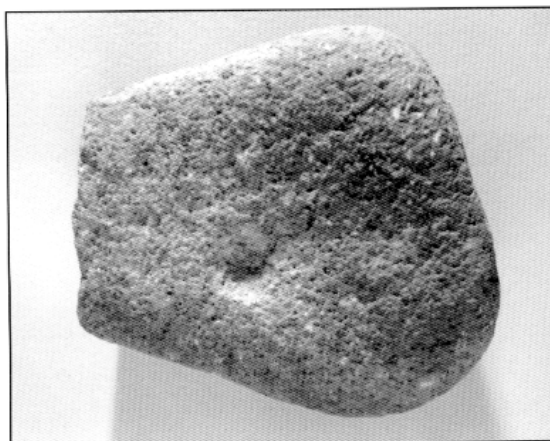
圖十五 三角形石鐮
Triangular stone adz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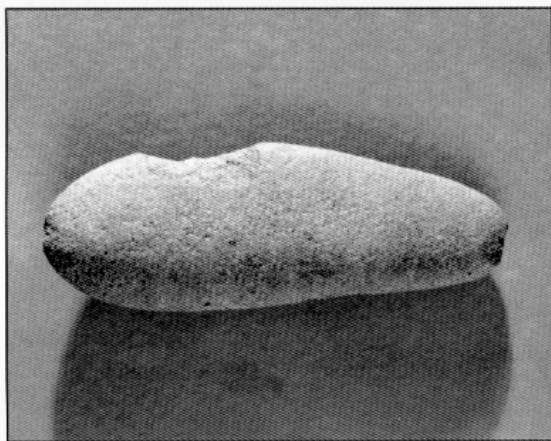
圖十六 石矛頭
Stone spear-head



圖十七 礪石
Polishing stone



圖十八 石砧
Stone anvil



圖十九 石杵
Stone poulder

七 年代

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應用科學系梁寶鑒博士，曾對沙柳塘灣遺址出土的史前陶片進行熱釋光年代測定，結果如下：

樣品號	測定年代
1) 4GL2	2535 ± 239
2) 4FL2B	4143 ± 394
3) 5EL2A	2969 ± 240
4) 5EL2B	3072 ± 254
5) 5EL2C	2811 ± 247
6) 5FL2B	3644 ± 219

根據這六個熱釋光測年數據顯示，遺址文化層的上限約為距今4200年，下限約為距今2500年，橫跨1700年之久。對一個厚約50厘米的單一文化層來說，這麼長的年代跨度顯然有問題。

本人曾對珠江三角洲史前遺址進行分期研究，根據不同遺址地層採集的木炭樣本進行碳十四測定的54個數據，配合地層出土遺物的綜合分析，把整個珠江三角洲地區史前文化分為五個時期，而沙柳塘灣出土的文化遺存，應屬於第四期，即新石器時代晚期，絕對年代介乎公元前2200-1500年之間⁽¹⁾。跟沙柳塘灣六個熱釋光年代數據比較，可見遺址的上限相同，皆為公元前2200年；但遺址的下限，熱釋光數據要比碳十四數據晚1000年。

其實，熱釋光測年方法，經常受到天氣和地理環境所影響，測定的年代有偏早或偏晚的現象，雖經多年研究，但仍然未能掌握其變化規律，難以進行校正。此外，熱釋光測年之誤差很大，前後就是幾百年，往往跨越一至兩個考古學文化時代。因此，熱釋光測定之數據，在目前富於變化的情況下，難以應用在考古學分期之上，沙柳塘灣的熱釋光數據就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八 討論

沙柳塘灣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存，以夾砂陶、幾何印紋泥質軟陶、磨製精美的各類石器為主要特徵。而印紋方面，又

以複線方格或菱格紋和重圈紋為特色。跟沙柳塘灣相同的文化遺存，遍及整個珠江三角洲地區，經調查發現的遺址不下一百個，而經發掘的亦有28個之多，其中15個在香港境內，即南丫島的深灣Cb層⁽⁴⁾、蘆鰲城中層⁽⁵⁾、沙埔村下層⁽⁶⁾；長洲的鮑魚灣⁽⁷⁾和大鬼灣⁽⁸⁾；馬灣的東灣仔；小鴉洲⁽⁹⁾、沙洲⁽¹⁰⁾、銅鼓洲上層⁽¹¹⁾、屯門的石角咀⁽¹²⁾和龍鼓灘；大嶼山的東灣⁽¹³⁾、蟹地灣⁽¹⁴⁾、沙螺灣岬角和扒頭鼓岬角。另外13個包括佛山河宕⁽¹⁵⁾、南海灶崗⁽¹⁶⁾、魷魚崗⁽¹⁷⁾、西樵山多石崗⁽¹⁸⁾、三水銀洲、增城金蘭寺中層A⁽¹⁹⁾、東莞村頭⁽²⁰⁾、深圳咸頭嶺上層⁽²¹⁾、珠海東澳灣⁽²²⁾、草堂灣⁽²³⁾、南沙灣⁽²⁴⁾、棧角嘴⁽²⁵⁾和平沙三四層⁽²⁶⁾。

從遺址的地理分佈和性質分析，上列遺址可分為兩大類。一是珠江三角洲平原前沿的小土墩上的貝丘遺址，另一類是河口灣外島灣或山灣的沙堤以及毗鄰的岬角遺址(圖二十)。這兩類遺址，從其面積以至遺物的種類和數量，都有極明顯的差異。貝丘遺址的面積一般都很大，往往超過一萬平方米，如河宕遺址，現存面積一萬平方米，銀洲遺址超過二萬平方米，村頭遺址亦超過一萬平方米。相反，沙堤和岬角遺址以中小型為主，一般都只有幾百平方米，最大的亦不過二至三千平方米如深灣和扒頭鼓岬角等。

貝丘遺址出土的遺蹟和遺物都十分豐富，遺址內更有明顯的分區情況如墓葬區、生活區和垃圾棄置區等，顯示貝丘是比較大型和長期性生活的聚落。如銀洲遺址，崗頂中部為墓葬區，已清理墓葬40多座；崗頂外圍及其與崗坡的過渡地帶為生活居住區，已發現房基多座，為木骨泥牆，崗坡以及坡下平地為垃圾棄置區⁽²⁷⁾。村頭遺址以台地的北部較高且平緩處為居住區，已清理房基約20座，屬地面形建築，木骨泥牆，屋內地面用純淨黏土鋪墊，並經火烤；南部低地為垃圾堆積區，此處靠近古海岸，有通海水道利於排污；墓葬區在遺址東北或北部，暫未發掘⁽²⁸⁾。河宕和魷魚崗兩遺址，見於報告者，只是墓葬資料。河宕清理了51座墓葬，魷魚崗亦清理了36座，表明兩遺址都有大片墓葬區。

比較起來，河口灣外的沙堤和岬角遺址，遺物和遺蹟都顯得頗為貧乏。在眾多的沙堤遺址中，只在龍鼓灘發現了十多個柱洞，可能是一間干欄式建築的遺蹟⁽²⁹⁾。沙柳塘灣發現的四個小洞，是否柱洞仍屬疑問。墓葬亦極少在沙堤遺址發現，只在深灣Cb層發現六座和東灣仔發現一座。但岬角遺址卻多見建築遺蹟。沙螺灣岬角發現了很多柱洞，估計是多間干欄式建築遺蹟⁽³⁰⁾；扒頭鼓岬角亦已發現了三座房子遺蹟⁽³¹⁾，但是否地面建築，抑或干欄式建築，則未見報導。不過，兩岬角遺址都未發現墓葬。此外，沙堤和岬角遺址內都沒有明顯的分區情況，陶器、石器和骨器等碎片每多零星散佈整個遺址的範圍內，推斷是先民在沙堤和岬角上作短暫活動時遺留下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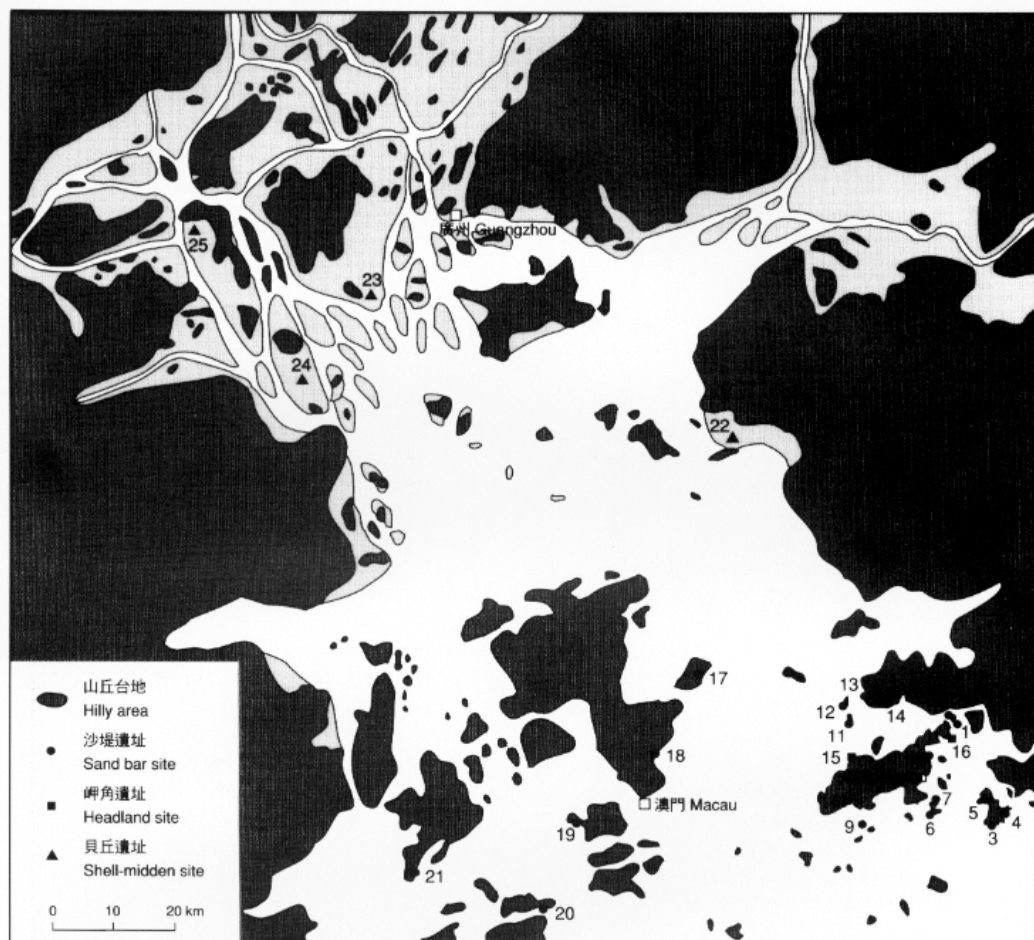
貝丘遺址和沙堤及岬角遺址間的巨大差異，可能是受地理環境和食物資源所影響。位於珠江河口灣內小土墩上的貝丘遺址，在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其實處於濱海地區⁽³²⁾，但河口灣內風平浪靜，很少受變幻的天氣影響，而當時的海邊低地屬潮間帶，鹹淡水貝類和海藻類茂盛生長，為先民提供大量的食物。於是，古海岸邊的小土墩就成為先民理想的長期定居之所，而先民食用後棄置的貝殼，逐漸堆積成貝丘，據估計貝殼的總重量少者數十噸，多者超過一百噸。至於孤懸在河口灣外的島嶼，因沒有遮掩，容易受到海浪和季候風直接侵襲，只有東向或南向的海灣沙堤較為適合先民活動，加上島嶼山多平地少，山上密林滿佈，雖有野生動物，但狩獵困難，食物資源有限，因此沙堤絕非長期定居的理想地方。

在河口灣內長期定居的先民，之所以老遠跑到河口灣外小島上的沙堤和岬角活動，可能跟珠江口外季節性出現的魚汛有關。據調查所得，每年的春夏季，珠江口外都出現魚汛，稱為「萬山春汛」，汛期為一至三月。每年冬季，珠江口外的沿岸流從東向西流，而底層的南海暖流卻是西向東流，因此引致海水幅散和上升，把底層富於營養的海水帶

到表層，提高水域浮游生物的密度，從而誘使攝食魚類聚集，成為魚場⁽³³⁾。在深灣和鮑魚灣兩沙堤遺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層內，出土了大量魚骨，其中以硬頭海鯰(*Arius leiotocephalus*)為最多，次為斷斑石鱸(*Pomadasyidae* hasta)，應為先民食用後棄棄的魚骨。這兩種魚類，一般在水深20-70米之間活動，但每年春至初夏，牠們必游至近岸淺海區產卵。由此推測，住在河口灣內的先民，可能已掌握了魚汛和魚類產卵的時間，較為年青力壯的先民，為捕撈這些季節性出現的魚群，從平原的基地出發，利用舟筏一類的水上工具，跑到海島上的沙堤暫時棲息，當魚群消失後，他們又回到基地上生活⁽³⁴⁾。因此在沙堤和岬角遺址裡，極少發現墓葬，遺物亦較零星。

陶系比例上的差異，亦可能反映了貝丘長期性和沙堤臨時性活動的分別。貝丘遺址以泥質陶為主，夾砂陶為次。如河宕第二層，泥質陶佔71%，夾砂陶佔21%；灶崗遺址泥質陶71%，夾砂陶29%。相反，沙堤遺址則以夾砂陶為主，如深灣C層夾砂陶佔80%，泥質陶20%；南沙灣夾砂陶佔90%，泥質陶佔9%；沙柳塘灣夾砂陶佔80%，泥質陶佔20%。吳曾德等認為，生活在沙堤遺址的先民都屬遷移性，那種合炊、盛功用為一體的夾砂陶釜和罐最便於攜帶，因此沙堤遺址以夾砂陶為主⁽³⁵⁾。其實，夾砂陶器形簡單，容易在沙堤上就地取材製造，而且燒製火候不高，約650℃左右⁽³⁶⁾，在沙堤露天生火即能燒成，而泥質陶陶土經過洗練，器表多拍印工整的幾何圖案，都是要花時間和心思的工作，加上泥質陶燒成的火候約900-1000℃⁽³⁷⁾，須搭建陶窯才能把陶器燒成，因此，泥質陶應是定居在貝丘上先民的產物，燒成後才帶到沙堤上使用。

沙柳塘灣遺址，雖曾受取沙嚴重破壞，出土遺物和遺蹟不多，但綜合珠江三角洲同期遺址的發掘資料分析，沙柳塘灣文化遺存屬新石器時代晚期，介乎公元前2200-1500年之間，先民把沙堤作為季節性和臨時性的活動場所，並主要以捕撈為生。



採自李平日等《珠江三角洲一萬年來環境演變》

- | | | | |
|-----------------------------|--------------------------|----------------------------------|---------------------|
| 1. 沙柳塘灣
Sha Lau Tong Wan | 8. 蟹地灣
Hai Dei Wan | 15. 沙螺灣岬角
Sha Lo Wan Headland | 22. 村頭
Cuntou |
| 2. 東灣仔
Tung Wan Tsai | 9. 小鴉洲
Siu A Chau | 16. 扒頭鼓
Pau Tau Kwu | 23. 河宕
Hedang |
| 3. 深灣
Sham Wan | 10. 東灣
Tung Wan | 17. 東澳灣
Dongao | 24. 灶崗
Zaogang |
| 4. 蘆鰲城
Lo So Shing | 11. 沙洲
Sha Chau | 18. 棱角嘴
Leungjiaozui | 25. 銀洲
Yinzhou |
| 5. 沙埔村
Sha Po Tsuen | 12. 銅鼓洲
Tung Kwu | 19. 南沙灣
Nansha | 26. 金蘭寺
Jinlansi |
| 6. 鰓魚灣
Po Yue Wan | 13. 龍鼓灘
Lung Kwu Tan | 20. 草堂灣
Caotangwan | |
| 7. 大鬼灣
Tai Kwai Wan | 14. 石角咀
Shek Kok Tsui | 21. 平沙
Pingsha | |

圖二十 珠江三角洲四千年前古環境和遺址分佈圖
Locations of neolithic sites in Pearl River delta area of 4000 years ago

註釋

Abbreviation: AMO - Antiquities & Monuments Office; JHKAS - *Journal of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 (1) B.A.V. Peacock, *Report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urvey Vol.III Part 2*, unpublished report, AMO, 1985.
- (2) 鄧聰等：《北大嶼山考古調查報告》，1991年4-9月，未刊稿，古物古蹟辦事處，1991年，頁157-161。
- (3) 鄧興華：〈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分期〉，載於鄧興華編：《嶺南古越族文化論文集》（香港：香港市政局，1993年），頁40-55。
- (4) 秦維廉編：《南丫島深灣考古遺址調查報告》，香港考古學會，1978年，頁125。
- (5) W. Meacham: Lo So Shing. *JHKAS* Vol.VIII (June, 1980), pp.16-26.
- (6) W. Meacham: Sha Po Tsuen. *JHKAS* Vol.XIII (1993), pp.33-54.
- (7) J.R. Crawford: Po Yue Wan. *JHKAS* Vol.XI (Aug, 1986), pp.64-79.
- (8) H.A. Peters, S. Bard: Tai Kwai Wan. *JHKAS* Vol.IX (June, 1982), pp.25-34.
- (9) R.J. Frost: Siu A Chau. *JHKAS*. Vol.VIII (June, 1980), pp.37-40.
- (10) R.J. Frost: Sha Chau. *JHKAS*. Vol.VI (June, 1976), pp.37-50.
- (11a) W.J. Kelly: Tung Kwu Phase 3. *JHKAS* Vol.VI (June, 1976), pp.51-54.
- (11b) W. Meacham: Tung Kwu Phase 4. *JHKAS* Vol.VI (June, 1976), pp.55-66.
- (12) P. Salmon: Shek Kok Tsui, Castle Peak. *JHKAS* Vol.III (Nov, 1972), pp.18-23.
- (13) 區家發等：〈香港石壁東灣新石器時代遺址—1987, 1988年兩次發掘綜合報告〉，《香港考古學會會刊》第12期，（1990年1月），頁45-69。
- (14) B.V. Williams: Hai Dei Wan. *JHKAS* Vol.VIII (June, 1980), pp.27-51.
- (15) 楊式挺等：〈談談佛山河宕遺址的重要發現〉，《文物集刊》第3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頁234-243。
- (16) 廣東省博物館：〈廣東南海縣灶崗貝丘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4年第3期，頁203-211。
- (17) 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等編：《廣東文物普查成果圖錄》，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0年，頁3。
- (18) 張鎮洪：〈1986-1987年西樵山發掘簡報〉，《文物》，1993年第9期，頁32-39。
- (19) 莫稚：〈廣東考古調查發掘的新收穫〉，《考古》，1961年第12期，頁666-668。
- (20) 邱立誠等：〈東莞村頭遺址發掘的初步收穫〉，《廣東省博物館館刊》，第2期（1991年6月），頁70-73。
- (21) 深圳博物館等：〈深圳市大鵬咸頭嶺沙丘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11期，頁1-11。
- (22) 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珠海市淇澳島東澳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0年第9期，頁797-802。

- (23) 梁振興、李子文：〈三灶島草堂灣遺址發掘〉，載於珠海市博物館等編：《珠海考古發現與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22-33。
- (24) 趙善德：〈前山鎮南沙灣遺址發掘〉，同上，頁34-45。
- (25) 龍家有：〈香洲區稜角嘴遺址發掘〉，同上，頁46-56。
- (26) 珠海市平沙區等編：《珠海平沙出土宋元文物》，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9-13。
- (27) 粵考文：〈三水銀洲貝丘遺址發掘獲重要成果〉，《中國文物報》，1993年6月20日。
- (28) 粵文考：〈東莞村頭遺址第二次發掘收穫頗豐〉，《中國文物報》，1993年9月5日。
- (29) 《屯門龍鼓灘遺址1994年發掘報告》，未刊稿，古物古蹟辦事處。
- (30) 同(3)，頁44，圖9。
- <31> 〈扒頭鼓發現新石器晚期村落遺址〉，《文匯報》，香港，1994年12月23日。
- (32) 李平月等：《珠江三角洲一萬年來環境演變》，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頁80-90。
- (33) 農牧漁業部水產局等編：《南海區漁業資源調查和區劃》，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89年，頁63-69。
- (34) 朱非素：〈珠江三角洲貝丘，沙丘遺址和聚落形態〉，載於鄧聰編：《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219-227。
- (35) 吳曾德、葉楊：〈論新石器時代珠江三角洲區域文化〉，《考古學報》，1993年第2期，頁153-169。
- (36) 黃素英：〈淇澳島後沙灣、三灶島草堂灣遺址出土陶片測試〉，同(23)，頁314-316。
- (37) Y.C. Tsui. Preliminary Tests on Neolithic Sherds. *JHKAS* Vol.VI(June 1976). pp.116-119.

鳴謝

這次沙柳塘灣發掘，考古隊成員包括鄺興華、佟寶銘、譚美兒及四位馬灣村民勝嫂、富嫂、福嫂和榮姑，發掘隊顧問為Dr. S. Bard。發掘能順利完成，實有賴古物古蹟辦事處和香港博物館全副鼎力支持，以及香港皇家賽馬會慷慨提供發掘經費。在發掘進行期間，更得到很多熱心考古人士到遺址參加義務發掘工作，其中包括區家發、李美樺、林淑貞、孫得榮、馬文光、Paul Welling, Beverley, Hirschel、香港大學藝術系時學顏教授及學生，以及參加香港博物館第一屆田野考古訓練班的學員如陳嘉美、趙秀芬等。因參加義務工作人數眾多，未能一一盡錄，在此向各熱心人士和 好友致衷心感謝。

Salvage excavation at the late Neolithic site at Sha Lau Tong Wan, Ma Wan

Chau Hing-wah

[Abstract]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of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conducted a 6-week salvage excavation from December 1991 to January 1992 at Sha Lau Tong Wan, Ma Wan, before the site was bulldoz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antau Fixed Crossing. Sha Lau Tong Wan is a bay situated at the southeastern coast of Ma Wan (Fig. 1), where Cheung Chau granite of the Upper Jurassic period was outcropped. Behind and parallel to the modern beach is an old sand bar of about 100m long and 5 to 6m above sea level. Towards the southern end of this sand bar is a small stream flowing from the surrounding hilly area into the sea. As the bay is sheltered and fresh water can easily be found, it is an ideal living place for ancient folks and in fact, late Neolithic cultural deposit was discovered in the old sand bar during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archaeological team in 1991.

During this 6-week excavation, 18 trenches covering a total area of 350m² were dug (Fig. 2,3). It was found that cultural deposit at the southern portion of sand bar had been badly disturbed by massive sand removal for building purpose in the post war years. Fortunately, the northern portion of the sand bar still remained intact and cultural deposit of late Neolithic period was found at about 50cm below ground level (Fig. 4). In sq. 4F, 4 holes with diameter ranging from 19-25 cm were found. As three of them were arranged almost in a straight line, these

holes may be interpreted as post-holders (Fig. 5). In sq. 5E, 4 pieces of large pebble stones, 30-35 cm in length, were found lying horizontally almost at the same level with a flat and smooth surface facing upward (Fig. 6). The arrangement of these pebbles suggested that they might be the seats of the Neolithic folks.

Finds from the late Neolithic cultural layer were mainly pottery and stone artifacts. Potteries were divided into 2 fabric types : coarse ware and soft earthenware. A simple sherd count revealed that coarse wares account for 80% of the sherds while soft earthenware only 20%. The coarse wares were often decorated with cord pattern while the soft earthenwares were stamped with concentric rings or lozenge and raised dot designs. Altogether, 9 pieces of pottery wares were reconstructed and only 2 of them were soft geometric wares. The site also yielded 23 pieces of stone artefacts which include 7 polished adzes, 1 polished spear head, 3 polishing stones, 10 anvils, 1 pounder and 1 grinding stone.

Based on the typology of the potteries, the site was dated to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a, which dated between 2200-1500 B C. However, pottery samples were sent to the Hong Kong City Polytechnic for thermoluminescence dating and 6 dates were given. The earliest date was 4143±394 while the latest date was 2535±239, covering a time span of 1700 years which

is obviously too long for a Neolithic cultural phas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a, over 100 sites with cultural remains similar to that of Sha Lau Tong Wan had been discovered. Among them, 28 sites had been excavated scientifically,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2 main groups - the large shell midden sites in the delta plain area and the sand bar sites on the islands off the river mouth. It was discovered that the shell midden sites were often very large,

e.g. the Cuntou site was over 10,000m² while the Yinzhou site over 20,000m²,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ernally into living ground, burial ground and rubbish dumping ground. On the contrary, the sand bar sites were very small, often less than 1,000m² and the finds were not rich. It was therefore proposed that the shell midden sites were in fact the long term living base of the Neolithic folks while the sand bar sites were just seasonal out-posts for hunting and fishing.